

知识分子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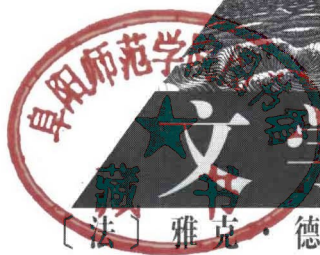
文学行动

〔法〕雅克·德里达 著 赵兴国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109.18
18

知识分子图书馆



文学行动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赵兴国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行动/(法)德里达著;赵兴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212-1

I. 文… II. ①德…②赵… III. 结构主义学派-文学理论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69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4

字数:304 千字 印数:1 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汪民安 张旭东 章国锋 谢少波

HASP/22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萨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萨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斯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桦、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 10. 于北京

前言：《文学行动》的基本观点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生于阿尔及利亚,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60—1964年在索邦大学教授哲学,1965年起任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曾创立巴黎国际哲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现为巴黎高级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75—1985年任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每年在该校教课一个学期。现仍为厄湾加州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客座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写作与差异》(1967)、《文字学》(1967)、《扩散》(1972)、《哲学的边缘》(1972)、《立场》(1972)、《丧钟》(1974)、《明信片》(1980)、《另一只耳朵》(1982)、《哲学的法则》(1990)和《马克思的幽灵》(1993)等。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德里达积极参与了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的传统争论。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意识的“存在”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关于无意识的发现和无意识记忆的理论。而他对语言的理想主义概念的质疑,则是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当然,他也受到一些法国思想家的影响,最明显的是莫里斯·布朗肖,德里达和他一样,也推崇写作的“痕迹”,认为它是存在和不在的最初运作。

德里达批判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他认为这种传统受到一种假想的“存在”话语的支配,例如假想真理是意识存在对自身和

对其客体的一种作用，假想时间走向它的终结（历史毁灭），像耶稣基督的重现或出现超验的所指那样。德里达把这种假想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词语中心论”相联系，指出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里，对“存在”的信念与赋予言说的特权（与文字符号或书写相对）共同合谋。他坚持认为，在西方思想史里，文字的表达与言语相比一直在贬值，因为按照西方的传统，言语或声音更接近思想和意识。

德里达早期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分析不同作家和思想家的著作，展现种种形而上学假想的支配和统治的情况。他所说的“解构主义”主要在于进行某种分析，颠覆那些顽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德里达也表现出对那些文本本身的兴趣，因为它们解构自身所依托的传统的框架，试图检验和强化以词语为中心的疆界。于是，尼采、阿尔托、巴塔耶、热奈、邦戈和塞朗等都成了他研究的对象。这种双重的焦点形成了贯穿德里达整个作品的一种模式。

同样重要的是德里达的“边缘”解读策略。按照传统的阐释学或哲学观点，文字书页的空白边缘对注释和边注代表一个重要的理解和评论的空间。虽然某种解释的权力因此被归之于边页的空白，但边缘和中心仍然由明确区分的边限定。针对这种把边缘作为主要文本之外一个固定空间的概念，德里达提出文字符号之外额外的空白书页，可以暗指在标出的空间之内和之外都发生作用的意义边缘。对德里达来说，边缘和中心暗示着在超越二元对立的过程中被嵌入的一些构成的局限。“边缘”解读对美国解构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它变成了一种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按照这种解读方法，文本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边缘”方面（常常在于一个关键的词或一系列同类的词）可以被分离出来，作为一种暗中破坏文本一致性和可理解性的轨迹；而按照传统的解释，一致性和可理解性只有通过一种压制行为才能维持。就此而言，德里达创用的一些双重性的词，如“补充”、“结合”、“辅

助”等，可以看作是他的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在德里达看来，这些结果共有的东西是它们与写作的关系。它们是写作的形象及其在形而上学历史中的矛盾的双重性。他认为写作有两个方面，从否定方面看，写作似乎完全是第二位的、外在的、必然而又危险的对言语的补充。写作再现并产生一种自然的、逼真的“存在”，但以主体及其意义变成不在和死亡为代价。然而写作的另一面是形而上学传统无法压制的一面，它是一种普遍的和原始的写作，是表意活动的首要条件。不过，德里达并不只是通过支持写作对抗言语来重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尽力表明言语和写作为什么具有共同的特征。他认为，主体的不在和指称是一般表意过程可能的后果，因为不论说出或写出的任何符号的可理解性，都依赖于能指符号的一种区分网络。而主体通过符号的机制之后，其真正的构成便被分裂开来。由于同样的原因，所指的推延或“真正的意义”也变得永无止境。

对德里达的著作一向颇有争议，对他的理论的批评和运用也多种多样。许多人认为他的著作是哲学著作，既晦涩难懂又脱离文学实践。那么，为什么他在美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了不只一代人呢？这或许应该从他强调的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来考虑。

“什么是文学？”自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来，对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一直是个核心问题，然而这也是西方哲学传统中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要求说明文学的本质，说明究竟是什么把文学与所有非文学的东西区分开来。作为一个反传统的哲学家，德里达自然对这个问题也深感兴趣。但德里达不是寻求一种严格的哲学答案。他认为，这个问题像所有的问题一样，也是通过语言阐述的；而且他不断提醒人们，这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其实，他思考的是“什么是（文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他问，是不是可以说“文学”一词反过来也对“什么是（文学）”提出挑战，

对后者关于本质、同一性和真理的设想提出挑战？德里达认为，对这个问题作抽象的哲学思考毫无价值；它需要人们读大量称作“文学的”文本，而这样做人们会特别注意到文本如何暗中确认或动摇哲学的设想，但本身并不提供任何哲学的论证。所以德里达称，文学文本是召唤阅读行为的写作行为。

德里达所说的阅读文学的行为直接涉及到哲学，并与他对哲学、语言学、神学、法学、美学以及其他各种非文学文本的阅读密切相关。德里达真正的论点是：尽管文学是对哲学的潜在挑战，文学研究也受到哲学设想的支配；当然哲学更受其设想的支配，虽然它对自己的设想有着批评反思的悠久传统。在他看来，文学理论或诗学总是有意识地在哲学的标志下进行运作，但文学批评大部分也在古希腊思想确立的范围内运作，承认演绎推理的规则，承认意义最终先于阐述的方式，并承认一些基本的绝对对立，如理念对感觉，形式对内容，主体对客体，自然对文化，存在对不在，等等。在《立场》一文中，德里达曾以实例指出，意义或内容的价值，形式或能指的价值，隐喻或转喻的价值，真理或再现的价值，都是由哲学派生的支配文学的范畴。

在强调文学与哲学的上述关系时，德里达并不是在攻击这种传统，而是在攻击他所阅读的哲学家。他说：“我非常喜欢我以自己的方式所解构的一切事物；我想从解构的观点阅读的文本是我喜欢的文本，并带有阅读不可或缺的那种认同的冲动。”（《另一只耳朵》英文版第87页）确实，他的论文学文本的著作产生于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强烈反应。他坚持认为，没有任何文本完全受哲学观念和对立观念的支配，一切文本都可以作为“文学的”来阅读。在德里达看来，传统上作为非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并不是它们对隐喻或修辞的运用问题；他在《白色神话学》里论证说，隐喻完全是（即使并非只是）一种哲学的修辞方式。但是，德里达同样认为，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完全”是“文学的”：一切语言和解释行为都依赖于哲学范畴和哲学的设想。

根据上述看法，德里达对传统文学文本的解读，显然很难与他对其他文本的解读作明显的区分。因此，这里选译的德里达论文学文本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与他自己的思想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里选择这些文章的基本出发点是纠正人们的偏见：即认为他的作品与文学没有密切的联系。

文学批评家在解读文学文本时最常引用的德里达的著作，基本上都是论哲学文本的著作。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德里达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讨论引起人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注意，但它们不是我们所运用的‘解构主义’这一术语的意思；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主要受他对哲学著作的解读的影响。”（《论解构》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第213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学批评的传统受哲学思想的支配；二是人们以为只有在他对哲学文本的解读中才能真正了解他的思想。那么，德里达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他对哲学文本的解读是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在德里达的著作里，哲学与文学的对立通过他对两种文本的解读已经消失。德里达认为，任何以文学的“自由运作”或“文本性”为名而从写作实践中排除哲学的思想注定要失败；哲学永远会从“后门”进来。文学作为不受制约的修辞或作为“外在于”哲学实践的概念，其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概念。但是，德里达也强调指出，为了把握哲学与文学的共同含义和它们的特征，必须尽量把它们作为像夫妻那样的一对来理解。这就是说，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不可能分开。虽然德里达论文学的著作不一定比他论哲学的著作更有文学的风格，但这里选译的论文学的文章确实既包含文学的方法也包含哲学的方法，探讨并说明了许多从文学的特殊状况所产生的相互关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德里达解读哲学文本所论及的问题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些文章里，德里达反对先验化和普遍化的倾向，尽力说明文学文本基本上是境遇性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写出来并被

阅读再阅读的文本。他认为文学文本具有一种单一性，不可能被批评或理论思考再度归纳。因此，他自己著作里这种性质的存在，乃是对他在文学文本中所发现的东西的一种反应，也是对他可以在读作文学文本的哲学文本中所发现的东西的一种反应。但是，德里达并不强调单一性本身，而是强调单一性和普遍性之间令人困惑而又富有成效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不只是一种悖论式的共存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互相依赖的关系。在他看来，如果文学文本每次碰到时都是单一性的，那么它根本就不会触及到人类世界；虽然它的可读性和它所具有的“意义”通过特殊的阅读和解释很容易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也包含着某种重复、某种规则、某种类型的想象。所以，文学文本若要能被解释，它必须属于某种文类或某些文类，或一系列指导阅读的普遍化的常规。然而，每当文本自身标示为写作、文学、或属于某个文类时，它都要通过一种事先作为标志而标出的标志，即通过德里达所说的“重新标示”。德里达认为，在这种时刻，形式和内容的范畴就会消失，出现“差延”（*différance*）的运动：重新标示在一切文本里永远有可能存在，而文字可以非常有力地展现它的运作，并在这种运作中产生非常的乐趣。

按照德里达的看法，文学文本不是词语的画像，也不是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的空间；它不是丰富的多种意义的所在，而是一种仍然具有潜在意义的“意义的抽空”；它没有一种摆脱变化的独特性的核心，但具有一种可重复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依赖于对新语境的开放，因此也依赖于它每次重复时出现的差异。德里达认为，那种标示出特定文学文本的东西也是“普遍文本”的性质——而普遍的文本无论如何不能局限于语言或印刷符号。（参见本书《危险的补充》一文。）就此而言，这里德里达论文学文本的著作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评论，不是批评也不是解释。像一切有价值的文学阅读一样，它们试图使文本“显得陌生或奇怪地熟悉”，它们不是提供一种简单化的对文本的看法，而是提供一种在其困难层

面上运作的文本方式；它们不只表现主体对某种客体的作用，而且这些阅读本身也被它们阅读的文本阅读。对德里达来说，文学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它的读者。

德里达的意图是动摇文学传统本身的话语和机制。他认为文学文本像签名一样是一种行为。在法律文化中，签名依赖于两种矛盾的特征：独特地证实此时此地的签名人，同时它又可以重复、可以辨认、可以复制。文学文本也具有签名这种自相矛盾的特点，它既制作又模仿，既是事件又是法律。文学文本的行为可以取代并重新安置哲学中的对立关系，如独特的与一般的，具体的与空想的，习惯的和由规则支配的，等等。对文本的每次阅读都是对这种“对立关系”的两面的反应，而这样的双重反应包含着对两种性质互为依存的一种理解：它是既支持又破坏逻辑的一种摇摆。

由于德里达的解读是对某个特定境遇的反应并召唤另一种反应，所以他不要穷尽文本或确定文本的意义。人们不应该按照对解构主义的误解认为文本只是一种文字的实体，或只是书页上的文字；解构主义力图表明的是，文字制品永远不能自行封闭，从文学中召唤读者的另一面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语言范围之内。德里达自己曾说：“我总是对某些批评家感到吃惊，他们把我的作品看作是‘语言之外再无其他’的一种宣言，我们被囚禁在语言之中；事实上，这是在说完全相反的方面。对词语中心论的批判首先是寻求‘其他’和‘其他的语言’。”（《与当代大陆思想家的对话》，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第123页）

上述这些可以说是本书表达的基本观点，或者说集中的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因为所收文章主要论及文学文本，或许本书会使读者对解构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有更好的认识，改变那种认为新理论脱离文学作品实际的偏见。

王逢振

1997.12.

目 录

前言：《文学行动》的基本观点	(1)
一、访谈：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	(1)
二、“……危险的增补……”	(42)
三、第一部讨论	(72)
四、在法的面前	(119)
五、类型的法则	(155)
六、《尤利西斯》留声机 ——听人说乔伊斯内心的“是”	(194)
七、《心灵》[节选] ——他者之发明	(250)
八、《签名蓬若》[节选]	(282)
九、不合时宜的格言	(304)
十、马拉美	(325)
十一、残酷戏剧和表演的封闭	(340)